

一、敦煌的上古历史与居民

提到敦煌历史，人们就会想起《尚书》记载的舜“窜三苗与三危”的“三危”。认为《尚书》中的“三危”就是今天敦煌县境的三危山，并由此说明，早在尧、舜、禹时代，敦煌地区就与中原地区有了联系，并接纳了一大批三苗族成员。

实际上，《尚书》中的“三危”并没有在敦煌，从目前已有文献和考古资料看来，在汉代时，“三危”都还没有和敦煌发生关系。

那为什么人们都将“三危”与敦煌相连呢？从现有资料可知，最早将三危与敦煌联系起来的是杜预，他在《左传》昭公九年注中说：“允姓，阴戎之祖，与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实际上《左传》的原文是：“允姓之奸居于瓜州。”而瓜州又在西裔 因此

杜预一方面将三苗与允姓之奸等同，另一方面又将瓜州与三危等同。再加上瓜州即敦煌，故三危也在敦煌。自杜预这样解释以后，“三危”就算和敦煌结缘了。遂后，许多人都附会了这一说如《水经注》说：“三危山在敦煌县南”；《括地志》说：“（三危）山在沙州东南三十里，山有三峰故名。”实际上，目前还无法确定“三危”具体的地望。何况传说中尧、舜、禹的活动地域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其影响所及根本不会达到敦煌一带，所以也不可能把古敦煌作为流放罪人的地区。

既然如此，作为注释《左传》的学者杜预，为何又将三危与敦煌相联系呢？这就又涉及到了瓜州的问题。早在东汉初年，瓜州就被认定在敦煌。这是因为王莽末年杜林曾避乱于凉州，知敦煌出“美瓜”，遂以为敦煌即古瓜州。班固在著《汉书》时，在《地理志》敦煌郡敦煌县下注曰：“杜林以为古瓜州，地生美瓜”。由于史学家班固记录了杜林的看法，此后人们遂将敦煌定为《左传》中的姜戎、允姓之奸所居之瓜州。

实际上，这种说法漏洞颇多，阚骅在《十三州志》中首先提出怀疑：“瓜州之戎为月氏所逐，秦并六国筑长城，西不过临洮，则秦未有此地。”顾颉刚先生在 1937 年著文辨正，解放后又重申旧说，认为“瓜州”不在敦煌，而在关中秦岭一带。他认为瓜州之戎即《左传》中的“九州之戎”，古音瓜、九同在见纽，音同故通假；姜戎自称为“四岳之裔胄”，顾先生考证出最早之四岳“为西方萃聚之四山”是姜族兴起之地，则四岳所在即瓜州所在；最后结论说：“窃意瓜州当在今凤翔之东，实居秦晋之间，故秦人得而迫之，晋人得而诱之。”故予敢断说，瓜州必不在敦煌。^①刘光华先生也通过考证得出了

①：见顾颉刚《九州之戎与禹戎》，载《禹贡》第 7 卷 6、7 合期；《史林杂识 初编》。

结论，《尚书》中的“三危”不在敦煌，《左传》中的“瓜州”不是敦煌。^①

我们所说的敦煌地区上古居民，是指汉王朝控制河西以前活动于敦煌地区的民族。

河西地区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交汇之处，民族角逐频繁，其居民也常常处于流徙移动的状态。地处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地区，其上古居民就具有了这种移徙流动的特点。

关于敦煌的上古居民，据文献记载，主要有三苗、允姓之奸（瓜州之戎）、乌孙、月氏和匈奴等。前已辨明，三危不在敦煌，瓜州也不是敦煌，因此三苗、允姓之奸等就应被排除在敦煌居民之外。

从总体上说，我国古文献对古代西部地区的居民有一种传统的称谓，即氏羌、羌戎和西戎。如《诗·商颂·殷武》曰：“昔有成汤，自彼氏羌，莫不敢来享，莫不敢来王。”郑笺云：“氏羌 夷狄国在西方者也”；孔疏曰：“氏羌之种 汉世仍存，其居在秦陇之西，故知在西方者也。”《说文解字》曰：“羌，西戎牧羊人也 从人从羊 羊亦声。”《风俗通》曰：“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从这些记载可以得知，地处我国西部地区的敦煌，其上古土著居民应属于氏羌（或羌戎、西戎）这个大“类”。

1976 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今疏勒河流域的玉门市火烧沟发现了一个古文化遗址——火烧沟类型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遗物非常丰富，除常见的陶器、石器、铜器、金银器外，还有马、牛、羊、猪的骨骼，尤其是“羊骨多而普遍”，“随葬的成对的羊角，分为大羊、中羊、小羊”。火烧沟类型文化的这

见刘光华《敦煌上古历史的几个问题》，载《敦煌学辑刊》第 3 期。

一特征 与文献中记载的羌“主牧羊”、“西戎牧羊人”是一致的。而火烧沟类型文化的时代，据 C14测定，其年代“最晚为公元前一六〇〇多年”^①，大致与夏代相当”。从所获遗物来看，火烧沟人的社会生活并不比中原地区的华夏族落后，而且还与外界有了交换关系。在社会发展阶段上，“火烧沟墓葬贫富和等级差别，非常明显”。因此火烧沟人，和华夏族同时或稍后即“已进入了早期的奴隶社会”。^①

火烧沟类型文化的分布，除玉门、敦煌平原外，向东已达到了民乐、山丹一带，但没有越过大黄山。从考古学人类划分来看，在夏代及其以前，大黄山以西（包括敦煌地区）的居民是火烧沟人，而大黄山以东的武威、永昌平原则是齐家人。因此可以说，火烧沟人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敦煌地区最早的上古居民。

战国至秦，文献中所见敦煌地区的居民有月氏和乌孙。如《史记·大宛列传》载：“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汉书·张骞传》曰：“昆莫父难兜靡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乌孙本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汉书·西域传》也说：“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史记》、《汉书》的这些记载虽然清楚地说明月氏、乌孙是敦煌的居民，但还是比较笼统。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月氏故地在甘州附近，而乌孙的活动地域在月氏以西，即今酒泉以西的敦煌地区。

作为敦煌地区的主人乌孙，原来就是敦煌地区的土著居民，还是从其他地方迁徙而来？由于古文献资料的缺乏，目前已无法回答了。从现有资料可知，秦朝末年，乌孙受到了邻近强大的月氏族的攻击，其王难兜靡战死，其子逃到匈奴，被冒

①《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载 1980 年《甘肃省历史学会论文集》 甘肃省历史学会 1980 年内部印行。

顿单于收养，其地亦被月氏人占据。

秦朝时期，月氏是敦煌乃至整个北方的强大民族。据《史记·匈奴列传》载：“当是之世 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单于……乃使（太子）冒顿质于月氏。”秦二世皇帝胡亥元年（公元前 209 年），冒顿即立为匈奴单于后，便开始了雪耻的准备。随后就发动了一系列扩张战争。其中在汉王刘邦四年（公元前 203 年）以前的一次战役中“西击走月氏”即在匈奴的打击下，月氏向西逃亡了。

匈奴击走月氏后，便控制了整个河西。正如《汉书·地理志》所说：“自武威以西 本匈奴浑邪王、休屠王地”。直到汉武帝时派霍去病攻打匈奴，占据河西走廊为止，匈奴在敦煌地区的活动约 100 年。

二、“敦煌”释义

敦煌这个名字，是汉武帝建郡时命名的。根据古籍记载 此地古属雍州。《尚书·禹贡》篇在论述九州中的雍州时，就明确指出其西界为黑水：“黑水西河惟雍州。”《文献通考》卷322 《舆地考八·古雍州条》解释说：“西据黑水，东距西河，西河即龙门之河也，在冀州西故曰西河；黑水出今张掖郡鸡山，南流至今敦煌，经三危山，过今南溪郡而入南海。”又说：“汉之京兆、扶风、冯翊、北地、上郡、安定、天水、陇西、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 皆其分地。”

在我国古史传说中也曾涉及到敦煌这个地区。如《尚书·舜典》说，在虞舜时，帝舜曾经“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许多人认为“三危”

就是指今敦煌南面的三危山。《左传》襄公十四年，晋范宣子数姜戎氏说：“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又昭公九年，周詹桓伯辞于晋，也曾说：“允姓之奸，居于瓜州。”这都是晋惠公由秦东归，迁戎于伊雒流域近于周王都城雒邑所引起的问题。允姓为阴戎之祖，也就是后来的姜戎氏。杜预解释说：“瓜州在今敦煌。”实际上，在杜预之前，杜林就已经这样认为了。《汉书·地理志》敦煌县的注文说：“杜林以为古瓜州，地生美瓜。”唐代颜师古更作补充说：“即《春秋左氏传》所云‘允姓之戎，居于瓜州’者也。其地今犹出大瓜，长者狐入瓜中，食之首尾不出。”

其实，瓜州之戎并非就在敦煌，这一点顾颉刚先生曾提出五大理由予以驳斥。但由于杜林的说法几成定论，后魏明帝时竟于敦煌设立瓜州，经过一度改名，瓜州还是成为定称。

《禹贡》于黑水、三危之外，还提到弱水、猪野、合黎和流沙。《禹贡》述道水，是先说弱水而后才提到黑水。由此可知弱水也是一条大川，后来人们认为今张掖河相当于弱水。如果这一认识不误，合黎山和流沙也就容易解释了。今合黎山在张掖西北，张掖河绕合黎山之西而北流，正和《禹贡》所说相符合。张掖河下人居延海，其周围皆为沙漠，也恰好可以解释所谓的流沙。因此，《禹贡》的作者对于雍州的西部，也就是后来的河西，虽然不能像对当时其他诸州那样的了若指掌，基本上还是相当明了的。因为这里当时可能还是从事游牧的族类所居，和内地诸侯称雄的局面不同。^①

《史记·五帝本纪》引《括地志》曰：“三危山有三峰，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敦煌县东南三十里。”《水经

参阅史念海《河西与敦煌 上篇》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 年第 4 辑。

注》卷 40 《禹贡山水泽地所在》说：“三危山在敦煌县南。”在《元和郡县图志》卷 40 中 唐代李吉甫这样认为：“三危山在（敦煌）县南三十里，山有三峰，故曰三危，尚书窜三苗于三危 即此山也。”清人常钧在其《敦煌杂钞》卷下《三危山》中说：“尚书孔安国传，三危西裔之山，舜窜三苗于三危，禹贡三危既宅是也。隋志敦煌县有三危山，括地志山在沙州东南三十里，山有三峰故名。都司志三危为敦煌望山，俗名升雨山，在今城东南三十里，三峰耸峙，如危欲坠，故名。”

敦煌的含义为何？它得名于什么？历来存在分歧，至今仍然未有定论。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看，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 汉族名称

东汉应劭在《汉书·地理志》中注释“敦煌”二字的意义说：“敦，大也。煌，盛也。”认为敦煌是一个很繁华的城市。唐代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解释说：“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认为这个地方对开发广大的西域地区有很重要的作用，故名之曰敦煌。

李正宇先生根据《史记》、《汉书》等关于河西及敦煌的记载，认为“在敦煌建郡之前十余年已有敦煌之名，知敦煌一名原所固有。十余年后建郡，乃因原名而名郡。‘敦煌’一名尚属汉人取自土著民族，而当地古代民族更何由用汉语名其山曰‘三危’名其地曰瓜州？”

据李先生研究，应该是汉朝占领敦煌后，见敦煌东南之山，顶有三峰，次第排列，遂将《舜典》、《禹贡》中的“三危”一名移置此山。自汉武帝建郡直到西汉末，长达 130 多

李正宇《敦煌历史地理导论》第 32 页~ 33 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7 年版。

年，对此名呼之既久，乃习以为常，便以为敦煌“三危”即古之“三危”。除此之外，还有心理因素的作用。第一，出于当地人自矜乡土之情。人皆欲所生乡土为自古名区，求之古典，《舜典》、《禹贡》恰有“三危”，《左传》又有“瓜州”，于是就附会渲染，形成舆论，久之，便弄假成真了。第二，出于政治之需要。敦煌建郡之后，大批移民陆续迁来，而当地固有之匈奴、乌孙及羌人遗民及其文化传统受到排挤，民族矛盾继之而起。而被汉人赶走之匈奴、羌人政权也常想赶走汉人，夺回故地。汉人则欺匈奴及羌戎无古典可稽，而自举出《尚书》、《左传》之“三危”、“瓜州”，以证敦煌早就属尧舜旧城，三苗顽嚚，不过谪居于此，地本属我，今物归原主，名正言顺；杜林之父杜邺，成帝哀帝间为凉州刺史，青年杜林随父尝居凉州，中年遭王莽之乱时，复与弟杜成再来凉州避难，熟知当地关于“三危”之新说。东汉初杜林返回长安，授徒讲学，便用在凉州的见闻来阐释三危瓜州。班固注《汉书》时虽引其说，而云“杜林以为”，可知班固将其仅视作一家解经之言，不作定论也。

2. 少数民族语

对于敦煌的汉名解释，一些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看法。日人藤田丰八在其《西域篇》考订说，敦煌可能是都货罗 Tokhara 的译音，而都货罗即汉初居于敦煌、祁连间的月氏族。认为敦煌是少数民族语的音译。

刘光华先生认为，“敦煌”一名在汉武帝设置河西郡县以前很早就出现了。《史记》、《汉书》所记载的“敦煌”和后来的敦煌县、敦煌郡无关，因为它反映的史实发生在战国末至秦汉之际。而和“祁连”连用的“敦煌”，肯定不是指敦煌县、敦煌郡，它和“祁连”一样，应是当地土著居民所呼土名的汉音写名。这个汉音写名的发明权或者就是属于张骞的。至于

“敦煌”一词的原意，早在东汉就无法知道了，所以应劭从汉语之字面意义上给予解释。

刘先生说，“敦煌”这一土名，虽然后来为汉朝郡县所沿用，但其所指地区的范围可能比日后的敦煌郡为大。河西走廊可分为三个自然区域，每个自然区域又与一个较大的内流河流域相对应。今山丹境内的大黄山以东为武威、永昌平原，属石羊河流域；大黄山以西至今嘉峪关西的黑山为酒泉、张掖平原，属黑河流域；黑山以西至今敦煌县西境为玉门、敦煌平原，属疏勒河流域。疏勒河流域的玉门、敦煌平原，应是古敦煌的范围。其土著居民沿河而牧，往返活动于疏勒河流域的绿洲上，故范围较大。而后来所建立的敦煌郡则为一政治区划，其范围指今玉门、敦煌平原之西部，即安西、敦煌两县境疏勒河以南地区，这是汉朝统治者从军事、政治需要出发而规划的行政建制，与该地区上古居民依自然山川河流劳动、生息，并作为其活动范围有所不同，前者较小，后者因任自然形势，故比较大。^①

施萍亭先生也认为，对于敦煌的解释，“少数民族语的可能性要大些”^②。

王宗维先生认为，“敦煌”是族名，它是我国的一个民族，即吐火罗的简译。在《“敦煌”释名——兼论中国吐火罗人》^③一文中认为，《山海经·北山经》、《水经注笺》卷2所记载的敦薨，其范围约当今巴龙台以南，包括焉耆、库尔勒，再向东直

参阅刘光华《敦煌上古历史的几个问题》，载《敦煌学辑刊》第3集。

施萍亭《敦煌随笔之一——“敦煌”二解》载《敦煌研究》第3期，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③ 《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

至罗布泊方圆数千里的地方。在这样广大的地区，山名、水名、泽名均以敦薨一词命名，根据我国西北地区往往有地从族名的习惯，说明在这个地方曾经有过一个很大的民族敦薨人在此活动，时间从《山海经》一书成书的年代推测，约在中原战国时期。

多数学者认为，西部吐火罗是从东方迁去的，也就是说，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东南，曾是吐火罗人的根据地，当时吐火罗人就生活在这里。根据战国至秦汉时期中原人译边疆地区人名、地名、族名的习惯往往取两个字简译，省去其他音节，这样吐火罗就在《山海经》中译为“敦薨”，《大宛列传》中译作“敦煌”。因此，敦煌一名在汉代以前作敦薨，都源于吐火罗一词的第一音节，也就是说，敦煌一名是吐火罗的简译。

另外，有的学者又提出敦煌为羌语译音。在《敦煌与莫高窟释名及其他》^①一文中，李得贤先生认为河西走廊的庄浪，今藏语义为野牛沟，张掖的原义是野牛之乡。他说：“敦煌之为羌语译音，盖与庄浪、张掖、删丹等相同。我曾为此遍询深通藏语文的专家，他们根据我的提示和设想，最终由索南杰同志提出‘朵航’的对音来，这在现代的藏语中是‘诵经地’或‘诵经处’的含义。”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即岑仲勉先生在《释桃花石(Taug-as)》^②一文中提出的。岑先生从东罗马作家 Simocatta (约当我国隋代人 其著作成于公元 610 年) 以 Taugas 称我国，昆莫河诸碑亦以 Tapgac 称我国说起，认为此二称“虽译写略异，然语源同一，世无异议”，而沿用期间计 600 余年中见于汉译只一次，即《长春真人西游记》云：“土人惟以瓶取水。

《青海社会科学》1988 年第 5 期。

《东方杂志》第 33 卷第 21 号（1936 年）。

戴而归，及见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谓汉人也”，从而认为“桃花石”为城名。从历史上看，敦煌不仅是中西交通之咽喉，而且是国际商业之集散地，它“握北门之锁钥者，最少可六百载，其历史如是久且要，外人叩关投止，因以初到之封境为称，渐乃变成国号，固自然而然之事实矣”。岑先生还将大月氏、靛货罗、桃花石名称字母进行排比研究，指出“敦煌”为译名，而 *Taugas* 为“敦煌”之对音。至于“敦煌”这个译名，“究本自大月氏语、匈奴语或其他中亚语，今不可知；东罗马、突厥、西亚之译名，其为间接本自我国之‘敦煌’，抑直接本于以上各语，今亦不可知。展转重译，对音之不能十分吻合，无怪其然矣”。确定“敦煌”为译名，但未推定是何种语言语词。

钱伯泉在《“敦煌”和“莫高窟”音义考析》^①一文中，从另一角度研究了这一问题。他指出，敦煌的汉族居民是设郡以后由内地迁徙去的，此前的居民应是少数民族。因此，若要正确解释“敦煌”这一地名的含义，必须研究汉朝以前敦煌的土著居民。

早在商朝，渭水流域及其以西，都是氐人和羌人的居地。周族刚刚兴起时，曾经长期居住在戎狄之间。“戎狄”的“狄”应是“氐”的异译，氐、狄实际上是指同一种类的北方民族。可见周族兴起时，渭水以北是氐人（即狄人）的势力范围。

周人所说的“鬼戎”，商族称之为“鬼方”，其族的首领又自称“翟王”；“翟”是狄、氐的异译，可见鬼方、鬼戎实际上指的是“狄人”，又译作“氐人”，有时又被称为“戎人”。他们原是我国北方与中原农业民族最为接近的游牧民族。在我国

的西北地区，在汉朝以前，他们大致居住在渭水和祁连山以北，他们的南方则是羌人的居住区。

后来，在戎狄与秦人的交战过程中，它们或归服于秦国，或西迁甘肃西部、青海北部和塔里木盆地南缘的阿尔金山、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内外。到了汉朝，河西地区便有许多以氏人命名的地区，例如张掖郡的“氏池”、敦煌郡的“氏置水”等。其中氏置水与敦煌的地名有着重要的关系。《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曰：“龙勒县，有氏置水，出南羌中，东北入泽，溉民田。”氏置水即今党河，“置”是“邮置”的简称，古代凡是用骑马的形式递送公文和信件的驿站，称之为“置”，汉朝又称为“骑置”。早在汉武帝统治的中期，这种骑置已设到西域的鄯善国（今新疆罗布泊一带）。西汉在敦煌设立郡县时，因为党河流域居住着氏人，又在河边设有骑置，所以称今党河为“氏置水”。

另外，钱伯泉先生还从音义的角度考证，姜姓、允姓之戎所居瓜州，本在姜水、雍水流域，今陕西凤翔一带。后姜、允之戎为周所迫，向西迁徙，至于敦煌。于是将“瓜州”旧名带到敦煌。同时，《禹贡》之“惇物”、《汉书·地理志》左冯翊武功县注之“敦物”即敦煌。

3. 与希腊人有关

1986年，海风的《敦煌地名的来源及其他》^①一文，对“敦煌”一词系匈奴语译音提出了异议，认为“敦煌”既不是汉语语词，也不是少数民族语词，而可能与希腊人有关。因为历史文献记载的大夏国，即希腊·巴克特里亚，在公元前3世纪已达帕米尔高原。其中的塞种人或塞人世居于敦煌。据此可知，“希腊人是早于匈奴人在敦煌驻足的。因此敦煌这个地名

的由来或与希腊人有关，而很难说是匈奴语的译音。”

与此相反，王翼青先生则认为敦煌地名与希腊人无关，因为海风先生的说法有一个关键性错误，即将 Scythians 人当作希腊人的一支。实际上，Scythians 人是从公元 7 世纪起活动于里海、咸海、锡尔河以北的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我国译作西徐亚人、塞西安人、斯基泰人等，相当于古波斯文献中的 Saka 人和我国古籍中记载的“塞种”或“塞人”。这个游牧民族实际上是操印欧语系东伊朗语的许多游牧部落的联合体，西起地中海东岸，东至我国西北地区，都曾留下他们的足迹。

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建立后，以锡尔河为界与西徐亚人相邻。西徐亚人既不和希腊人同族，又不是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臣民，在希腊人和西徐亚人之间不能划等号。正“因为西徐亚人不等于希腊人，所以汉代以前曾世居敦煌的塞种（即西徐亚人）也绝不是希腊人。‘敦煌’一名的来源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可以肯定与希腊人无关”^①。

关于“敦煌”二字的释名，李正宇先生的研究颇具启发意义，但根据目前占有的资料，我们认为敦煌一名，应该是少数民族语。因为在史籍记载中，敦煌与祁连是同时出现的，而“祁连”已确知是少数民族语。《史记·大宛列传》载：“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汉书·张骞传》说：“昆莫父难兜靡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汉书·西域传》也说：“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祁连一词，颜师古注《汉书》曰：“祁连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为祁连”^②。司马贞《史记索引》引

王翼青《敦煌地名与希腊人无关》，载《地名知识》1987年第4期。

《汉书》卷55《卫青霍去病传》注。

“小颜云：‘即天山也。匈奴谓天为祁连。’^①”既然“祁连”是少数民族语，那么与祁连相提并论的“敦煌”也可能是少数民族语。

三、汉代敦煌的大发展

从战国到秦，活动在敦煌地区的主要是月氏、塞种胡和乌孙等族。在这些种族中，以月氏最为强大。塞种“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为月氏迫逐，遂往葱岭南奔”^①。故到了秦汉之际，活动在敦煌与河西其他地区的则主要是月氏和乌孙了。

1. 汉代对敦煌的开拓

西汉初年，匈奴赶走了河西的月氏、乌孙，占据了河西。匈奴占据河西及西域后，除在占领区征收赋税外，还严重地破坏和阻塞中西交通；并与羌人连结，威胁着汉朝的安全。但是，由于西汉初期汉帝国的社会经济极端残破，再加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因此其国

《汉书》卷 96《西域传》。

势十分虚弱，无力抵御匈奴的进攻，从而不得不采取屈辱的“和亲”政策。

然而，西汉王朝的“和亲”政策，并没有满足匈奴奴隶主贵族的贪欲。他们经常侵汉边郡，杀掠人民。“汉兴以来，修好，结和亲，所聘遗单于者甚厚；然不以重质厚赂之故改节，而暴害滋甚”^①。“匈奴数和亲，而常先犯约……反复无信，百约百叛”^②。

西汉王朝在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之后，至武帝即位之时，国力已很充实。而且经过平定“异姓诸王”的背叛，及经过文、景的削藩和平定“同姓诸王”的“七国之乱”后，中原割据势力和大商贾的势力都遭到了极大的打击，中央集权已大大加强和巩固。这样，西汉王朝就有足够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来反击匈奴了。武帝采纳抗战派大臣的主张，开始了抗击匈奴的战争。

西汉元光二年（前 133 年）的马邑之谋揭开了抗匈战争的序幕。它是西汉王朝与匈奴由“和亲”到战争的转折点。汉对匈奴的反击战争主要是元朔二年（前 127 年）的河南之战、元狩二年（前 121 年）的河西之战和元狩四年（前 119 年）的漠北之战。经过河南之战，收复了“河南地”；经过漠北之战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③。

河西之战主要是由青年将领霍去病领导进行的。汉武帝元狩二年（前 121 年），青年将领霍去病率轻骑万人由陇西出发作尝试性的进攻。霍去病的具体进军路线，是经过慎重选择

《盐铁论》卷 8 第 34 《结和》。

《盐铁论》卷 8 第 48 《和亲》。

③ 《汉书》卷 94 《匈奴传》。